

# 权力视角下中俄媒体的合作： 内涵、动力与路径

赵永华 张萌

## 摘要

随着国际社会的后现代性的显现，国家利益的实现与争夺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倚重暴力的手段，话语成为了重要的权力的资源、来源。话语在通过文本“时刻”来反映现实社会的时候，同时产生的还有一套意义系统，企图让大千世界产生“秩序”。大众传媒作为最主要的话语权的占有者，拥有强大的说服功能，只需付出很少的资源代价就能够使权力的广泛性与综合性得到充分发挥。中俄媒体形成了再生性的合作集团，成为一种可以用作是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是对国际话语权的再整合。双方的合作看似是各自共同的选择，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结构性力量的间接选择。中俄两国在媒体、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是权力资源（包括与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关的资源）与权力行为（包括与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关的行为）之间的转化过程，是双方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双方合作的核心内部驱动力。中俄媒体的合作是一个集体资源动员的过程，也应努力成为一个从实现说服到树立权威的过程，增强双方议程设定、影响他者初始偏好的能力。

## 关键词

权力、中俄媒体合作、权威、话语权

## 作者简介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张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zhangmeng\_ruc@qq.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217）的阶段性成果。

## Medi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Power of Cooperation

ZHAO Yonghua, ZHANG Meng

**Abstract**

With the appearance of post-modernit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alization and struggle for country's interest don't rely on violence like the past, but the discour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power. When the voice reflects social reality through text, what produces at the same time is a set of meaning system, attempting to create regularity in this world. Medi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orms a regenerative cooperation group, which has been a collective resource that can be used in polity and be a re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voi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seems to be their common choice, but also the indirect choice of structural fo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media, economy and military is ju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cluding relevant resources to soft and hard power) and power action (including that related to soft and hard power), the result of their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which is also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ir cooperation.

**Keywords**

power, media communication, authority, power of discourse

**Authors**

Zhao Yonghua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 supervisor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 is also a full-time researcher of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Meng is a PhD candidate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ngmeng\_ruc@qq.com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Major Project "Sino Russian media communicati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No.16ZDA217).

从2015年起,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均将双边关系的继续深化作为各自外交战略的主攻方向。2015年3月,俄罗斯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表示,俄方欢迎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且愿意在其框架内开展全方位合作。5月8日,双方首脑在莫斯科发表两份重要的《联合声明》<sup>1</sup>,进一步指明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发展方向。此外,中俄双方协议商定了多个重大项目,包括西线供气基础条件协议、“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协议、中国北斗系统与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数据共享等,涵盖了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内容方面。5月9日,习近平出席了俄罗斯在红场举办的阅兵式,西方领导人的集体缺席更是显现了中俄两国关系的“高水

平”。

中俄之间全方位的务实合作也涵盖了媒体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中最后一项提到：“巩固和深化中俄人文合作成果，继续办好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框架内的各项活动，扩大两国青年交流规模，开始筹办中俄媒体交流年”；2015年5月，两国首脑在莫斯科宣布2016-2017年为“中俄媒体交流年”。中俄双方在媒体领域的深入合作是国际舆论场中话语空间以及权力空间重塑的关键一环。

### 一、中俄媒体合作：国际话语权的再整合

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署以来，现代主权国家已延续了近三个多世纪，到目前为止，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权利和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国家行为体的一系列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亚历山大·温特,2014:228）乔治和基欧汉（George and Keohane）认为国家利益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亚历山大·温特（2014:230-231）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self-esteem），即一个国家进行自我再造的需求，是“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与之类似，布尔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包括维护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的存在；确保各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和平；限制暴力；维持信誉；稳定私有财产权等。他进而强调，世界秩序的维持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基于社会生活基本或首要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让规则发挥效力的制度。（Bull,1977:53）当现有的国际规则、话语秩序以及社会制度无法调适不断变化中的国家主体的利益时，不同“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往往会从改变既有国际体系的规则开始”（Gilpin,1981:187）。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所有国家都希望现有的国际秩序对自己更有利，因此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之争不可避免，是国家间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Bull,1977:55）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后现代性的显现，国家利益的实现与争夺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倚重暴力的手段，相反要实现所谓的“集体自尊”则越来越倚靠话语的力量，话语成为了重要的权力的资源、来源。

英国外交官罗勃·库柏将国家间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后工业化、工业化进行中、前工业化（Robert Cooper,2000）。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后工业国家，逐渐陷入了复合型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国际关系中，战争或者军事力量不再是处理国家关系的主要工具，权力的争夺越来越倚重于其他手段；在新

兴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印度、中国,军事的力量仍然是潜在的工具;在前工业化国家,如部分非洲国家,战争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现实主义的模式对于这些地区仍然适用。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处于“粘连”的状态,“复合型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延展,而不止局限于后现代化国家之间,许多地区和领域都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态,今天的国际关系与十九世纪时候大为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先进的民主国家再也不会付诸于武力去解决问题(ED Mansfield,J Snyder,2007:169),只不过在现今的国际情势之下,付诸武力或者动用战争去解决国际问题的代价和成本在逐渐升高,相应的其效能则不断下降,真正主导改变的不是“谁的拳头更硬”,而在于“谁的故事更动听”。信息战略(information strategy)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John Arquilla,David Ronfeldt,1999:x)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权力争夺,不再仅仅存在于真实的、有形的硝烟战场,“战场在人们心中”(Thom Shanker,March 4, 2010)。尤其是在资讯大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面对这种“富足的悖论”(paradox of plenty)(Herbert A. Simon,1998)如何抓住话语权成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资讯成为了权力的资源,谁掌握着有影响力且为多数人渴求的信息,谁就取得了权力。

“话语一词指谈话时,说话者(speaker)将其理念或讯息以一可以辨认而又组织完整的方式,传送给一听者(listener)的过程。但福柯扩大其定义,泛指人类社会中,所有知识讯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现象,皆为话语。”(福柯,1994:29)福柯反对把语言当成是一个清澈透明的反映事物本相的媒介,相反他认为语言和其他事物一样晦暗难明,充满了对知识的意欲乃至权力的伸张。福柯的话语分析将真实语篇的话语和语言分析排除在外,费尔克拉夫则将福柯抽象的方法与具体的话语实践相结合,他认为话语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着手:文本向度——语言、文字、符号等;话语实践向度——符号系统的组合产生新的意义;社会实践向度——话语生产权力(generative power)(Fairclough,1992:56-73)。在国际舞台上,不同行为主体的具体话语实践主要分布于三条轨道,第一轨道是各国的国家元首(及首脑)、议会、外交机构等官方机构或代表彼此之间围绕各自的国家利益展开的对话,主要形式包括各国元首以及世界精英们主导、开展的对话、秘密谈判和双边外交等;第二轨道则是其他轨道的实践活动在大众传媒领域的“映射”,是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综合呈现,其表象是媒介话语,但内涵却是政治格局,中俄媒体的合作和交流属于发生在第二轨道的具体的话语实践活动;第三轨道的主体



则是与官方组织相对的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社会活动家、普通公众等。国际媒体是话语生产与再造的主要场域，话语的本质永远是动态的，隐含了权力的过程。话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exclusion）（福柯,1994:31），将“疯癫”排除在社会之外，以赋予“文明”意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是浮光掠影，话语在通过文本“时刻”来反映现实社会的时候（Harvey & Braun,1996:78-79），同时产生的还有一套意义系统，是我们企图让大千世界产生“秩序”的一种行为（福柯,1994:34）。话语通过赋予意义重构社会常规的存在与权力的分配。话语不仅仅是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权力的载体。话语成为了文本、意义与权力的生产、积累、消减、流通的一个过程。大众传媒作为最主要的话语权的占有者，拥有强大的说服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权力形式，只需付出很少的资源代价就能够影响目标国的情绪和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发生政治派别的争斗时，党报、油印机、电台、通讯社等媒体成为了争夺的焦点，因为这些东西通常能够赋予那些意识形态集团以维护自身积极的政治实体形象的权力。中俄媒体的合作表面上来看是第二轨道话语实践的合流，其背后则暗含了权力的平衡与再平衡，通过媒体的联手以增加两国话语的影响力，从而对现有的话语秩序和国际规则进行结构性的触动与调整。中俄因为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形成了再生性的合作集团，共同的追求使得这个集团成为具有一致性的组织，成为一种可以用作是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为调动其他的资源提供了可能。

## 二、合作的外部动力：从一体性权力到分割性权力

中俄媒体的合作最直观的行为主体是中俄双方的政府、媒体，合作看似是双方的共同选择，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结构性力量的间接选择。社会力在行为层次下运作，型塑了基础社会结构、知识体系与一般环境。（Peter J.Katzenstein,2009）这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所塑造起来的社会结构成了制约主体行为选择的一种隐形力量，即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力。举例来说，为什么现代社会手机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直观上来看是人们主观的选择，但是如果将结构性力量纳入考量，人们的个人选择则是由很多无法直观注意到的力量决定的，之所以要使用手机，是受市场、广告商、制造商、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现有的国际格局，成为中俄媒体走向合作的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对于中俄媒体合作的动力，厘清行为主体的选择与其背后更大的国际社会结构的作用力是非常有必要的，二者的合作是双方主观意愿的体现，更是现有的国际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

当今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东强西弱”似乎已内化于国际秩序之中，话语结构

的不对称使得国际权力发生了倾斜,强者的利益成为了评判国际社会“正义”的主要标准。具体来说,美国一直处于控制国际走势的顶端,美利坚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一直将自己视为是正确的民族,会将光明带到全世界的民族,美国是离上帝最近的国度。于是,以这样的文化基因为内核便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道德空间。美国代表着正义、向善、发达、活力、光明,是道德秩序的榜样,处于道德合法性等级下一层的是其他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处在道德秩序最外围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样的道德空间秩序的划分下,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指点和干涉便具有了天然“合法性”,是一种优越的道德文化体系对其他落后的道德体系进行“救赎”、“征服”的过程,而不是强权压迫的过程。美国所划分的等级秩序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强大的发展实力,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对话时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在规则的制定中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逐渐布展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均衡的世界格局。

现有的话语秩序唯西方大国马首是瞻,而其他行为主体的话语能见度大打折扣。国际规则合理与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量:共同性(commonality),即体系中的行为主体对特定行为的预期以及对行为解释的共享程度;明确性(specificity),即这些共享的预期和解释以共享规则的形式明确的程度;自主性(autonomy),即规则的更新和落实无需外部强制力推动的程度。当现有的国际秩序只注重维护部分行为主体的利益,而忽略国际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共同的发展,且规则固化,使得一些利益既得者长期占据优势,处于弱势的行为主体一直得不到利益补偿,那么这样的秩序必然会受到来自不同力量的挑战。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体性的权力”(integral power)的转化、改造成为“分割性的权力”(intercursive power)的过程。所谓的“分割性的权力”是表示当事国家之间权力均势和范围划分为特征的权力关系。与其相对的是“一体性权力”,是指决策权和行为动议权都集中或垄断在一方手中。(朗,2000:15)

国际社会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在权力划分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斗争。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分割性权力对一体性权力的改造主要朝向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涉及到意志论(voluntarism)的问题,即平衡行为主体选择偏好的自由度,使得不同的行为主体都拥有能够实现自身意志的权力;第二个目标则是一种否决性的集团平衡(balance of veto groups),即每个行为主体都能够制止别的主体做有害于自己利益的事(David Riesman,1950:244-255)。面对美国扯着北约的大旗来对俄罗斯进行遏制,

欧盟“东方伙伴计划”加紧了拉俄后院“脱俄入欧”，深深伤害了俄罗斯的欧洲情节，而且美国的势力也不断在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兴风作浪”，中俄双方彼此借重，试图通过媒体合作打破现有话语秩序，是有效应对美国TPP、TTIP对中俄边缘化的有力制衡战略，限定权力占有者行为的有效性，将一体性的权力改变成更具制衡性的分割性权力体制。

### 三、合作的内部动力：从命令的权力到吸引的权力

权力被认为是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一种关系。（朗,2000:xi）国家的活动必然涉及权力，当一国向其他国家要求改变或继续某种政策时，国际关系开始运作。（林碧炤，2013：434-449）国家关系的运作伴随着权力的流动，如何看待中俄合作背后的权力走势需要从权力的基本概念入手。

权力一直是许多学科恒久的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学科就对权力进行了两场争论。第一场争论的议题是权力是一种“威望性的方法”（reputational method）还是一种“决议性的方法”（decisional method）；第二场争论是权力是某些集团用以牺牲其他集团从而保存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一般的社会资源？在第二场争论中，功能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威，而冲突理论家则主张权力有其不可简约的强制性特征。后者是对权力的第一个误读，即认为权力总是伴随着强迫、冲突、反抗。对权力的定义，最权威的应该是马克斯·韦伯的定义（Max Weber,1968:926），他认为：

一般来说，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为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为的人们的抵抗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能力。

一些学者在对韦伯的这一定义翻译时，漏掉了“甚至”一词，从而在理解韦伯权力观的时候将强制和利益上的冲突当做是权力自身的本质性的东西。不少学者在反对将强制内化于权力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吉登斯把权力看做是一种“改造性的能力”，是行为者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通过他人的服从）达到行为目的能力。

（Giddens,1979:88-93）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对吉登斯将权力与冲突、反抗区分开来的观点也表示赞同，他认为权力并非总是牵涉到要用制裁来克服反抗。（朗,2000:xiii）福柯则更加明确地拒斥那种否定性的权力观，不认为权力必然是一种起压迫、禁止作用的东西，相反他认为“权力之所以会成为善事，之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完全是由于如下事实：它不只是作为一种禁止作用的力量作用于我们，它还起沟通作用，并引起新的事物，它还带来快乐、形成知

识、产生讨论”。（Foucault,1980:119）显而易见，强制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绝非是权力本质性的与生俱来的特征。

英国哲学家波特兰·罗素曾将社会科学中的“权力”与物理学中的“能量”作了类比（Bertrand Russell,2004:4），但是这种比较很容易使对权力的理解陷入第二个误区——急于将权力变成是一种可测量的东西，而过多的关注有形的权力，而忽略了无形的影响力。现实主义（realism）学者强调国家的看得见的权力，即军事、经济、理性冷静的决策方式。中央情报局官员雷·克莱恩（Ray Cline）曾试图通过公式来衡量美苏权力的平衡，他提出：

$$\text{认知的权利} = (\text{人口} + \text{领土} + \text{经济} + \text{军事}) \times (\text{策略} + \text{意志})$$

通过这一公式，克莱恩认为苏联的国力是美国的两倍。（Cline,1975）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很显然这套公式所预测的结果并不符合实际，试图通过公式来量化权力似乎并不奏效。后来的学者也试图进一步完善权力的衡量指标，包括一个国家的资源（科技、企业、人、资本、自然资源）、国家的表现（外在限制、基础建设、理念）以及这些要素对军事能力与战斗力的影响。（Ashley Tellis,2001）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十九世纪那样，对一国权力的衡量不再是通过这些具体化的指标所能够全部涵盖的，过去那种将“赢取战争的能力”作为衡量标准已经开始动摇，仅仅将一些可见的资源、制度作为考量是远远不够的。

权力到底是一种“倾向性的”（dispositional）能力还是“情节性的”（episodic）的实践？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窥视权力的第三个误区，即将权力的资源与权力行为做了一种过分清晰的分割，而未能注意到权力资源向权力行为转化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权力就是“人们为追求一切显而易见的未来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切现实的手段”。（Thomas Hobbes,1958:78）一个人或集团能够用来去追求未来利益而施加的手段，是其所具备的一种能力，是一种倾向性的定义。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则更为明显，在他看来，权力作为“潜能”和作为“调控”的同义词，无疑是一种倾向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实际操作，是行为者所具有的从事某种特殊操作活动的能与才智（即使这种能力和才智并未能到应用）。（Gilbert Ryle,1949:116-125）伯特兰·罗素认为权力是产生预期的影响。（Bertrand Russell,1938:25）罗素的权力定义是一种情节性的定义，权力是一个施影响力而产生预期的过程，具有情节性。无论是将权力看做是一种倾向性的潜能，还是将其视为情节性的行为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拥有权力”，

后者则是“行使权力”。这两种视角看到的无疑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没有将权力试做是一种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的关系。雷蒙·阿弘则跳出这种二分的视角，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指出在英语和德语中，权力这个概念既表示从事某种事情的能力，又表示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Raymond Aron,1964）。

其实，对于权力的情节性或者倾向性的纷争是源于没有意识到权力行为与权力资源的分野，行为者所具有的资源（包括有形与无形的）可能会产生行为者所预期的效果，是产生权力的来源，而权力行为则是将各种权力资源进行动员的过程。不应当把权力本身看做是一种资源（Giddens,1979:91），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行为者为造成一定效果而对诸种资源的动用，权力并不像许多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或集团拥有的与诸如地位、技能、知识等不同的一种独立的资源，而是一种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或结局对这些资源的活化与利用（朗，2000:xiv-xv）。这与约瑟夫·奈达成了高度一致，“当我们将权力视同（或许）可以产生结果的资源时，常会碰上无解的难题，也就是那些拥有最佳权力的国家，却未必能够得到所期待的结果”（约瑟夫·奈,2011:29）。当然，这并不是无视权力资源的重要性，权力必须透过资源产生和传达。为什么拥有权力的资源却未必能够永远获得理想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权力脱离之前静态的分析方法（如：只看到权力特性的倾向性和情节性之分），将权力的资源与权力的行为放入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关键的中间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权力的转化。将资源用关系来衡量（Keith Dowding,2008），权力资源仅仅是权力关系的有形或无形的载具或原料，而不是权力关系本身，某种资源到底能否产生行为者所期待的结果，取决于权力的转化。这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关于权力到底是一种潜能还是一种行为的无止尽的讨论中，另外一方面还在权力资源和权力行为之外发现了权力来源的第三个维度（即权力的转化），从权力资源是否能转化为预期的权力行为，这也是行为者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所在。

中俄两国在媒体领域的合作实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发生与构建过程。认识这一过程则需要避开以上所提到的三个权力的误区，约瑟夫·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及近十年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使得关于权力的三个误区迎刃而解，能够为认识中俄两国的合作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实主义的学者们过分强调国家的军事、经济、冷静决策等硬实力。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舞台上的政府关系逐渐变成了政府关系与人民关系并存，全球环境的治理、恐怖主义等一



系列问题不再以国界为分割，而成为了全球问题。此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强调各国之间的合作。约瑟夫·奈在此基础上综合提出了“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的观念，呼吁各国透过现实主义及自由主义来关注三块棋盘<sup>2</sup>，并且认为当下的格局要求各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与他国合作，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虽然没有全球政府，但已经有全球治理”，“这套全球治理需要资源充沛的大国积极投入，也需要资源不等的国家在不同的议题上出钱出力协调合作，更需要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进行议程设定、政策协调、知识交流与规范设定”。（约瑟夫·奈，2011:7）在奈看来，权力并不意味着强制和压迫，相反他认为在许多的跨国议题上，只有通过赋予其他行为者以权力，才能够达成自身的目标。国际舞台上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不会永远都是一场正负相抵的“零和游戏”，一方通过强制、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权力这只是权力形式的一种。不能只考虑压制其他行为者的权力，而是必须同时思考与其他行为者的合作，以达成目标的权力（Peter Morriss, 2002:33-35）。只有这样，权力才能够成为一种“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

奈提出的“软实力”这个概念，既看到了权力绝非仅仅是一种强制的权力，也看到了权力背后有形与无形的来源。而关于“软实力”这个概念国内学者普遍存在一种误读，认为军事、经济的威力能够让人们转变立场是一种硬实力，软实力则是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相对应的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片面地认为军事力量一定就是一种硬实力，而价值观方面的力量则一定是一种软实力。硬实力的资源包括有形的因素，如军力与金钱，而和软实力相关的通常都是无形的因素，像理念、制度、价值、文化、政策等，但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区分从来不是绝对的，针对区分标准的误读约瑟夫·奈专门指出不能单一有形和无形来作为区分的条件：“我必须澄清，‘无形’并不是软实力的必要条件。我对软实力的定义是以行为作为出发点，指的是透过同化或吸引——而非胁迫或奖励以影响他人——达成自己所希望达成之结果的能力。而在探讨软实力行为与产生软实力的无形资源之间的关系时，我的用词也非常谨慎。”（约瑟夫·奈，2011:298）在奈看来，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是依据行为光谱来作出判断的（图1），而非是权力资源的有形或无形，武力、收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议程设置是硬实力，而被对方视为是正当的议程设定，以及正面的吸引力与劝服，在行为光谱上，奈将其归为软实力。软实力即使透过议程设定、劝服、诱发正面吸引力等同化手段，以获得所期待结果的能力。也就是说，有些与硬实力相关的资源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而有些无形的资

源也可能是硬实力，例如军事力量可以用来赢得战争（硬实力），可以用作援助俘获民心（软实力）；经济力量可以产生制裁作用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硬实力），也可以用作成功的示范（软实力）。一国的文化（可以吸引其他国家之处）、政治价值（如果在国内国外皆可一贯秉持）与外交政策（若可以让其他国家视为正当与符合道德权威）是软实力的三个基本来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者一般只注意到了奈提到的软实力的这个层次，所以将产生软权力的资源大大局限于无形的资源上，而将产生软实力的资源与行为混淆。所以，针对这种误读，奈指出“文化、价值与政策不是产生软实力仅有的来源。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硬实力行为，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行为，不仅可以用来产生胁迫，也可以用来产生吸引力”。（约瑟夫·奈,2011: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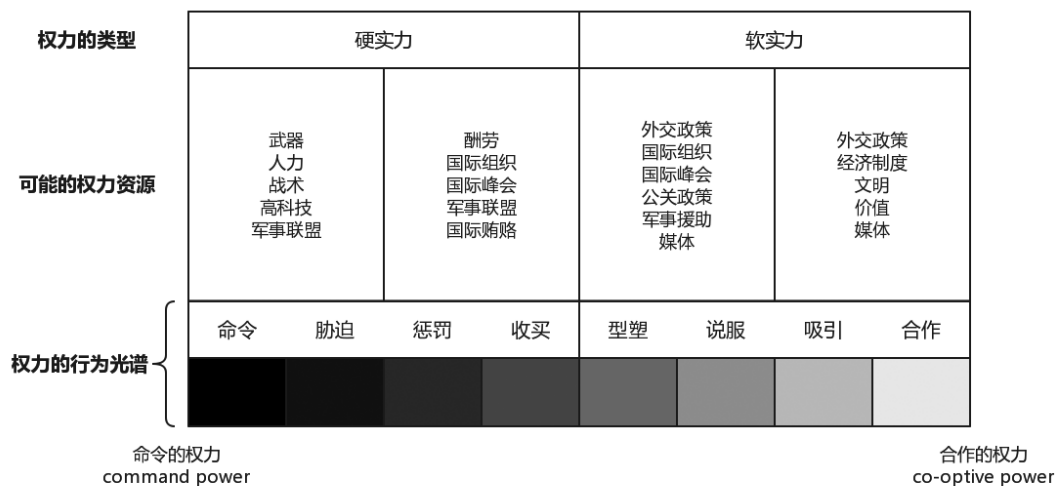


图1：权力的行为光谱以及可能的资源<sup>3</sup>

奈对权力的上述认识首先看到了权力并非仅仅靠强迫才能实现其目标，这突破了前文提到的对权力的第一个误解，认识到了合作也是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次，奈将权力的资源和权力的行为作了明确的区分，同时也意识到了权力资源向权力行为的关键一环——权力的转化，打破了对权力的后两个误区。对于权力的转化，奈认为拥有权力资源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所预期的行为，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以及行为者将资源转化为行为结果的技巧，注意到软实力的存在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硬实力（胁迫与收买等）与软实力（劝服与吸引等）的巧妙结合才能够产生所谓的巧实力。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中俄两国此次在媒体、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正是权力资源（包括与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关的资源）与权力行为（包括与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关的行为）之间的转化过程，是双方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双方合作的核心的内部驱动力。

自从2012年普京重返克林姆林宫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就一直不和睦。2014年伴随着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公投入俄，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欧美指责俄罗斯“吞并他国领土”并且开始了对俄罗斯的轮番经济制裁。美国开始大规模的开闸放油，宣布释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同沙特一起压低国际油价；并宣布将向欧洲提供自己的页岩气来接替俄罗斯的天然气。截至2015年12月17日，“国际油价继续下跌，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7美元，收于每桶34.95美元”，商务部刘华芹认为，“之前俄罗斯对低油价的心理预设底线是50美元一桶，如今竟然跌到了40美元一桶之下，同时俄罗斯储备基金消耗也已超过50%，经济结构转型又无法一蹴而就，再加上最近增幅明显的军费开支”（制裁,2016），俄罗斯想要依靠欧洲油气市场已“无力回天”。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自然会成为刚失去欧洲市场的俄罗斯油气的最好买家。中国庞大的能源需求对俄罗斯的油气正“如饥似渴”，“中国会在除了中东之外又多了一个巨大的能源来源，而且这条线路不受海上能源生命线的影响，即便是在战时，西方也没那么容易卡住中国的咽喉了”。在2015年中俄能源合作可以用“大手笔”来形容，5月，“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见证下，中俄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项目的‘世纪合同’——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紧接着，中俄又在西线天然气合作上大踏步拓展。2015年11月，两国元首又共同见证了关于通过中俄西线管道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的签署。”（中俄，2016）俄罗斯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与硬实力相关的天然资源，俄罗斯向中国伸出合作的橄榄枝，使油气这种硬实力资源转化为正面吸引力，成为了软性权力的来源之一。

与此类似，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也在通过这种“拉拢”的力量逐渐转化为一种软实力行为。困扰俄罗斯经济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西方的制裁以及油气价格的走低，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主要依靠外部因素运转的经济结构。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主要仍然是靠油气和军火生存，2014年俄罗斯油气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66%，油气企业的高回报使其具有强大的吸金能力，资本很难向其他产业流转，国民经济对能源产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靠油吃油”使其经济结构单一，很难抵御外力的干扰，在此番与西方的较量中，俄罗斯经济下滑，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较

上年萎缩3.7%，卢布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打断了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脚步。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2011年增至7.4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1/10左右，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多年来持续增长稳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按照世界银行网站统计数据整理发现在东北亚国家地区（中国、中国台湾、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蒙古国）GDP排名（除朝鲜外）中从2009—2014年中国的GDP一直稳居第一，2014年中国GDP是俄罗斯的4.9倍。”（杜洋,2015）中国经济发展现如今已经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中国完全有实力同时也愿意让俄罗斯搭乘中国经济便车，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此外，中俄双方不只是硬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行为，两国的软实力资源也相互吸引。这主要表现在中俄两国在政策、立场方面表现出来的相互的吸引力。两国在“一带”“一盟”的政策和理念上有很高的契合度，是软实力资源的组成部分，通过彼此的吸引创造正面的磁吸效应，推动双方在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领域的合作，使得软实力资源顺利转化为硬实力行为。“‘欧亚经济联盟’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其初衷是为了解决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公民在就业、关税等领域造成的诸多不便。”（苑昕雷,2015）苏东剧变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纷纷选择投入欧盟的“怀抱”，普京感受到了危机，他把整合后苏联空间作为第三期外交的主要任务，推动欧亚联盟的建设，并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拥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正式成员国。“根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欧亚经济联盟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与我国政府颁布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苑昕雷,2015）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旨在通过亚投行及“丝路基金”，与沿线国家开展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贸易投资等项目合作。在中亚，经济带的建设可以改善西部地区由于缺乏消费市场而发展相对缓慢的困局，成为实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措施，将中亚各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整个欧亚大陆将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具有重叠部分。在东北亚，中国正在振兴东北工业基地，与俄罗斯开发远东西伯利亚正好契合。所以，“一带”“一盟”的对接切合两国的利益需求，俄罗斯借助中国资金及改革的经验带动其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缩小俄罗斯欧洲



部分与亚洲部分的发展差距，中国借助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开拓通往欧亚大陆的桥梁，振兴东北经济的复兴。2015年5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经贸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当数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发表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启动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方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对接，旨在开拓欧亚大陆新的增长空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立场方面，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现今国际环境的空间维度来看，中俄之间因为有着诸多共同的立场而拥有持久稳定的双边关系。中俄双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双方更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终经过多次谈判，确定了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2015年举办的“5·9”红场阅兵式上，中俄首脑一再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坚决谴责任何美化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行径，要尽一切努力阻止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中两国也在各个重大事项上列举了双方的一致立场和原则：两国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果实，中俄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图谋，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决谴责美化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行径，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保持双边经贸合作稳定发展势头，在扩大双边贸易额的同时逐步改善双边贸易结构；实现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而非彼此隔绝，各国应本着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在恪守国际法的基础上照顾彼此利益，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当代问题和化解危机。中俄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努力促进世界的多极化，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以及区域问题上都坚持协商共议的原则，双方都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在台湾、车臣等牵扯彼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彼此相互支持，在对朝鲜半岛、乌克兰、非洲等地区安全与不稳定因素上，两国保持良好的沟通。而且，中俄两国作为上合组织、亚投行、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组织的共同成员，两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出发点。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点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开展合作的吸引因子，也是发挥彼此资源软实力的权力来源之一。

软实力是“拉”，硬实力是推“推”。在软硬权力的光谱两端分别是“命令的权力”（command power）和“合作的权力”（co-optive power）（图1）。“命令的权力”是一个国家透过胁迫与诱因直接命令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能力。“合作的权力”是一个国家策动一种情况使其他国家愿意根据该国的偏好而采取一致行动



的能力。(Nye,1990:31-33)中俄双方的合作正是权力行为光谱从命令的权力滑向合作的权力的过程。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与硬实力有关的资源)通过“拉”的方式,诱发其权力资源的正面吸引力,使其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有效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在软实力与硬实力等领域的权力合作行为。同样的,俄罗斯的天然资源(与硬实力有关的资源)也同样经过转化成为了俄罗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双方某些共同的政策、价值观和立场(与软实力有关的资源)也通过合作的手段使得其两国在不同的领域展开合作。从行为层面来说,软实力就是吸引力,从资源层面来说,软实力的价值就在于提供这些无形的吸引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要获得它想实现的结果,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的威胁与经济力量的制裁,而是通过其议程设定来吸引其他国家,使得其他国家对于该国的价值、典范颇为认可,或者期望达到同样繁荣开放的程度,愿意主动追随,这是一国软实力的最典型的体现。而什么因素才是一国能够具有吸引他国的合作的权力?亚历山大·弗文提到,行为体与行动的三组特质是构成吸引力的关键要素:良善(benignity),有胜任能力(competence),领袖魅力(charisma)。“良善”是指被他人认为行为体能够带来同情、信任、可信度与默许。“有胜任能力”是行为体的行为方式能够带来赞许、尊敬与效仿。“领袖魅力”是行为体的理念、价值、视野常会产生鼓舞和遵循。(Alexander Vuving,2009)中俄双方的共同立场、目标以及较好的往来历史使得彼此能够相互信任,相互鼓舞,而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与俄罗斯在军事、天然气资源的方面的优势使得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有足够的胜任能力来推动双方合作。

行为体的“合力行动,权力就会大量涌现”(Hannah Arendt,1998:200)。表面上看来,中俄媒体的合作是为了重新整合国际话语权,但背后却有着更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从外部来说,是对一体化权力改造的需要,从内部来说,中俄双方权力资源在转化为权力行为的过程也推动了双方在媒体领域的合作。权力资源转化为权力行为时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的终止,相反,新的权力行为也会创造、生产新的权力资源,同时权力行为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权力资源,可以转化为新的权力行为,权力关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图2)。权力关系就是在不断的转化过程中形成整合力的。中俄双方在经济、资源等与硬实力有关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双方在多领域的合作行为,包括双方在媒体领域的合作,而媒体合作这样的权力行为也会产生或者成为新的权力资源,通过合作来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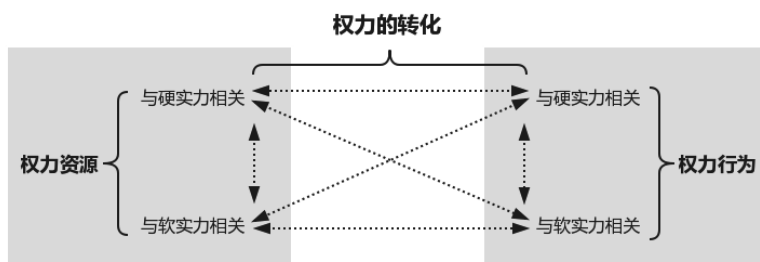


图2：权力关系是在不断的转化过程中形成整合力的

媒体资源如何转化为促进中俄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多领域合作的权力行为？这需要进一步明确中俄媒体合作的目标。宏观上来说，双方的媒体合作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传播信息，解疑释惑，构建命运共同体”。中俄两国虽然有着许多的历史和空间上的共通点，但是毕竟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所以在合作中需要媒体作为“润滑剂”，减少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因为误会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摩擦。而且中俄之间的政治战略互信也不能满足于现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在亚投行进入通道即将关闭的最后时刻才选择加入，远远晚于其他发达国家，可见其还是伴有疑虑；“中-吉-乌”铁路的受挫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表现的怀疑。“传递信息，消除疑虑”是媒体应该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双方的媒体共同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以获得两国人民以及沿线各国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推动两国建立利益相融、价值相通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利益共享、价值共通、责任共担”。将目标从宏观进一步具体化，则中俄双方媒体的合作主要应当切实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建设，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和国际正义，推动两国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中俄双方积极推动“一带一盟”的对接，以图扩大贸易促进相互投资的便利化，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媒体也应该以此作为主要的报道对象和服务目标，通过客观、公正、积极的报道来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中国和前苏联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为捍卫人类尊严、重建世界和平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所以两国媒体也应将捍卫二战的胜利果实作为具体的目标。

#### 四、国际媒体动员：从说服到权威的树立

中俄媒体的合作是一个集体资源动员的过程。动员指的是“为了追求集体目标

而组成的集团、联盟、组织的过程”（Anthony Oberschall,1973:102）。一致性是最基本的集体资源，而要保持合作的一致性必然离不开纲要性的指导原则，以清楚划约中俄双方对某种目标、价值体系、利益所应承担的共同义务与责任，将“相似的利益发展成为共同的利益”（Robert M.MacIver,1973:28-30）。中俄双方的媒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媒介经营管理体制，要想做到求同存异、和谐共赢，具体的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团结互助，平等对话，信息共享，共同发展”。“团结互助”是最基本的合作理念，基于共同的发展愿景双方彼此借力，优质资源共享，团结一致、互帮互助为共同目标服务；“平等对话”是双方合作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两国媒体在开展交流活动时应该始终建立在公平、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摒弃大国至上、强国至上的心理，使各方的利益、观点、态度、看法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表达；“信息共享”则意味着双方应该及时做到信息的互通有无，分享优质新闻资源，节约信息生产成本；“共同发展”则是最终的合作目的，双方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以共同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合作项目和措施都是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的，通过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明确的指导原则是确保组织内部一致性的重要凝聚力，是动员集体资源的基本前提。

中俄媒体的合作也应努力成为一个从实现说服到树立权威的过程。

行为体只有了解权力的作用形式才能够清楚自身所追求的是何种权力。罗伯特·达尔认为只要甲能让乙做乙本不愿意做的事，甲对乙就有权力，权力是让他人违背自身原本的偏好或策略去采取行动的能力。（R. Dahl,1961:1-8, 89-301）在达尔和林德布劳姆看来，那种利用讯息、报酬、剥夺他人权力行使范围而进行的操纵是范围最广的权力形式之一。（R.Dahl, Charles E. Lindblom,1953:105）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指出，达尔只注意到了权力最基本的形式，而忽略了“权力的第二种面貌”，即议题的型塑与设定。（Peter Barchrach, Morton Baratz,1963）所谓议题的型塑是指行为者能够通过自身的理念、机制主导行动议题，让其他行为者的偏好显得无关紧要或者超乎关键。权力的第二种面貌较权力的第一个面貌（达尔所下的定义）更为隐蔽，没有直接的胁迫与操纵，而是通过议题设定能力来左右他者行为，通过型塑议题、说服等手段来使那些与自身利益相符的声音被放大，违背自身意愿的声音则被禁音。从权力占有者的角度看，说服是一种最可靠的权力形式，它只需要付出很少的资源代价，并且最不容易引起权力对象的敌对情绪。（朗,2000:51）

到了七十年代,史蒂芬·路克斯提到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作用形式,即那种可以塑造他人初始偏好的理想与信念的力量。行为者如何赢得主体在情感与理智上接受其影响——是对主体行使权力,还是赋予主体以权力?(Steven Lucks,2007)笔者认为,行为主体赋予他者以权力,培养自身在他者心中的信任感和权威度,这种权威树立的过程便是行为主体重新获得权力的过程。权威是较说服更为隐蔽和高级的一种权力形式,受主体权力影响的客体可能根本无法感受到主体权力获取的过程,因为呈现在客体眼前的是主体权力的出让。不需要别人的强制或者说服,行为客体自愿迫随行为主体的安排与决定。在权威中,导致服从的并非是意见中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长期以来给客体带来了利益的补偿,从而使得主体的身份更具合法性。权威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等级制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为了使权威有效地发挥作用”。

(Talcott Parsons,1960)资讯时代,谁能够填补结构性洞隙(structural holes)(Ronald Burt,1992)之间的信息空白,准确、有效地告诉受众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何处,谁就能够拥有权力。伯特兰·德·居维奈认为所有的权力或权威都有三个向度:当权力对象是许多人的时候,它具有广泛性(existensiveness);当权力占有者能够使权力对象顺从行为的种类有很多时,它具有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当权力占有者广泛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时,它具有精密性。(Bertrand de Jouvenel, 1958:160)大众媒介在实现权力的广泛性与综合性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媒介美学和政治的合题形式几乎是无限的,它们既可以尽量迎合也可以强烈阻碍对政治的理解。”(梅耶,2009:26)中俄媒体合作努力的方向是说服目标受众认可、接受行为主体的观念、价值、态度、政策等,而这种说服需要大量的依据和精妙的传播技巧,为何西方的媒体拥有的话语权和公信力都很高,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累积性的过程中树立起了权威的形象,更容易获得受众在情感上的认同。因此,中俄媒体努力的方向不应只停留在说服受众这个层面,而应以树立合法的权威和能力的权威作为更高的目标。合法的权威能够产生出更多的预期感应,就像内化了的国际规范,更容易获得目标受众的信任。能力的权威则是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目标受众之所以更愿意接受A而不是B,是因为A拥有更为优越的能力和专长,能够为受众提供更具价值的信息和观点,更有利于受众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实现。而能力权威与合法性权威的树立则需要一定的知识或技巧。针对不同的目标对象制定多样的传播战略是增强中俄媒体说服能力,树立权威的有效途径。

对于中俄媒体来说,目标受众可以粗略地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即双方各自国



内受众、沿线合作国家、西方世界。中俄两国一直以来高层之间往来频繁，彼此之间打得火热，而人民之间的了解却比较少，所以应该从中俄两国民众彼此所想要了解的事物入手，根据他们的兴趣点来提供相应的信息，以此作为切入口逐步深入地拉近两国民众的情感距离。对于“一带”“一盟”战略部署的沿线国家，他们主要的关心点是自身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是否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两国媒体在对这些国家传递日常信息的过程中，更应该去向其明确“共赢”的理念，世界正在逐渐地连接成为一个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一体化是世界的发展趋势，所以合作意味着顺势而为，不同的主体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区域中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加快自身发展，加快融入世界大舞台，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利益享有者，而非个别国家利益独享。媒体应该充分尊重沿线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向它们阐明“一带”“一盟”并不是一国或两国独有战略，而是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利益的集体战略需求，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配合国内外的企业一起做到“弘义融利”。如何向西方传播我们的观点？目前，我国还没有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独挡一面的、能够广泛影响西方受众的国际媒体，而俄罗斯在这方面则要领先于中国。俄罗斯政府2005年12月成立的首家数字化电视网“今日俄罗斯”（RT）使用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来报道美国，而且经常能够为受众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获得了不少已经厌倦主流媒体报道格调的西方受众的青睐。RT敢于对俄罗斯政府进行抨击和揭发，并不一味地保持与政府立场的一致，对本国政府的负面消息也并不避讳，这就在国际受众的心里留下了客观、公正、独立的印象。从现如今中国国际媒体的发展水平以及政策环境来看，中国在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形成像RT这样能够与老牌国际媒体比肩的竞争对手，RT的“剑走偏锋”的媒体特色恐怕中国是很难“模仿”的。“借船出海”或许是可行的一种向西方传递中国声音的可能选择，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内容需要按着包括俄罗斯国际媒体这艘“船”的风格来进行一定的改造，以能够打动西方受众的方式来呈现，但是最终决定因素还是这艘“船”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异国“乘客”。

此外，中俄媒体交流的具体合作形式可以是选题共同策划、联合采访、稿件互换，合办专栏或专版，共同举办媒体以及高校新闻教育机构的论坛、研讨会、沙龙，开展人员交流与教育培训。同时，还应该注重拓展信息传播的新空间，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增进信息流通。近年来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人们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屏上阅读”的时代，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信息成了一种高效的渠道。在俄罗



斯,因为冬季长达半年之久,地域辽阔而且基础设施还不是那么完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拥有社交网络后变得更加便捷,再加上现在俄罗斯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网上的免费信息看起来比报刊更具有吸引力。但是也有人说,俄罗斯是一个崇尚阅读的民族,“低头族”的现象不像中国那样随处可见。那么,新媒体在俄罗斯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如何通过青年人热捧的社交网站(例如“结交”、“同学”等)来传递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如何通过俄罗斯的新媒体来塑造中国形象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责任编辑:李志敏)

### 注释 [Notes]

1. 两份声明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2. 约瑟夫·奈认为当今世界权力的分布近似一个复杂的三维棋赛(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在最上层的棋盘,军事力量几乎是单极的,美国超强地位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在中间的棋盘,随着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极的态势,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国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下层的棋盘则是跨越国界的跨国关系,包括一些非国家行为者,这块棋盘中的权力广泛扩散,也包括了很多新的挑战,例如气候变迁、传染病等,不再是政府之间的政治领域,而是跨国的政治领域,进入世界政治的门槛变低了,是一块我们没有太多经验可循的新世界政治。
3. 笔者参考整理自Joseph S. Nye的文章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5-15)。

###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丹尼斯·朗(2000).《权力:它的形式,基础和作用》(高湘泽,高全余译).台北:桂冠.

[Dennis H. Wrong (1994).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Taipei: Guiguan Publishing.]

杜洋(2015).深化人文交流和媒体合作,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访问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当代世界》,(08),23-25.

[Du, Yang (2015).Deepe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edia coop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ocking: Liu Qibao visit to Russia, Spain, Portugal.*Contemporary World*.(08), 23-25.]

米歇尔·福柯(1994).《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Michel Foucault. (1994). *Archeology of knowledge(Trans.)*. Taipei:Rye Field Publishing Co.]

约瑟夫·奈(2011).《权力大未来》(李静宜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Joseph S. Nye (2011).*The future of power(Trans.)*.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苑听雷(2015).中俄关系迈向新高度.《中国报道》,(06),26-29.

[Yuan, Tinglei(2015).China-russia relations to new heights. *China Report*, (06),26-29. ]

林碧炤(2013).《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台北:五南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Lin, Bizhao (201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olicy*.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Co.]

托马斯·梅耶著(2009).《传媒殖民政治》(刘宁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Thomas Meyer (2009). *Media erosions the politics*(Trans.).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制裁俄罗斯欧盟为何没完没了(2016年2月22日).检索于<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2/8223558.html>.

[Why do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endless(2016). Retrieved from<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2/8223558.html>]

中俄热乎热在哪?(2016年2月22日).检索于[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83852\\_2.html](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83852_2.html).

[Why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s so hot?(2016). Retrieved from[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83852\\_2.html](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83852_2.html).]

Arendt, 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on, R. (1964). Macht, power, puissance:prosedémocratiqueoupoésiedémoniaqu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1),27-33.

Arquilla, J., Ronfeldt, D., Barnes-Proby, D., Williams, E., & Christian, J. (1999). *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Rand Corporation.

Bachrach, P., &Baratz, M. S. (1963).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03), 632-642.

Burt, R. S. (2009).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ne, R. S. (1975).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Westview Press.

Cooper, R. (2000).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

Dahl, R., &Lindblom, C. E. (1953)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Dahl, R. A. (2005).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wding, K. (2008). Power, capability and ableness: the fallacy of the vehicle fallac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7(3), 238-258.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New York: Pantheon.

Fairclough, N(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Vol. 241).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Hedley Bull (1977)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bbes, T. (1958). *Leviatha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Lukes, S. (2007). Power and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83-97.
- MacIver, R. M. (1937). *Society: A Textbook of sociology*. New York: Rinehart.
- Mansfield, E. D., & Snyder, J. (2007).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MIT Press.
- Morriss, P. (2002). *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Nye, J. S.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 Oberschall, A.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Prentice hall.
- Parsons, T., & Bendix, R. (1960). Max Webe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25).752.
- Peter J. Katzenstein, ed., (2009)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Riesman, D., Glazer, N., & Denney, R. (2001). *The lonely crow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B. (1938). *Powerpower powe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Russell, B. (2004). *Power: anew social analysis*. Psychology Press.
- Ryle, G.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Bames and Noble.
- Shanker, T. (March.4,2010). Joint chiefs chairman readjusts principles on use of force. *New York Times*.
- Simon, H. A. (1998). Information 101: 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how you know it. *The Journal for 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21(4), 30-33.
- Tellis, A. J. (2001).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Vol. 1110). Rand Corporation.
- Jouvenel, B. D. (1958). *Authority: the efficient imperative*.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 Vuving, A. (2009). How Soft Power 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nel "Soft Power and Smart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eptember 3, 7-8, Toronto.
-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New York: Bedminster.